

##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摘要

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9。

摘要节选自：陈兼，刘昶：《〈叫魂〉译后——翻译札记及若干随想》，载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第338-368页。

### “盛世妖术”的叙事

《叫魂》的大叙事，是由一系列稀奇古怪、扑朔迷离的故事和案件串联组成的。把这些故事连接起来的，则是“盛世妖术”这个乍一看来十分奇特，仔细想来其实在中国历史上颇为平常的现象。孔飞力着力要做的，是在讲述这一系列故事时，把蕴藏在“盛世妖术”现象背后的种种时代的、政治的、社会的及文化的涵义写出来。

“叫魂”案发生在1768年，即清乾隆三十三年。这种妖术恐惧突然在中国爆发，从大清帝国最富庶的江南发端，沿着运河和长江北上西行，迅速地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愚夫愚妇们受这种妖术恐惧的支配，相信妖术师可以通过人的发辫、衣物，甚至姓名来盗取其灵魂为自己服务，而灵魂被盗者则会立刻死亡。从春天到秋天的大半年时间里，整个大清帝国都因为应付这股妖术之风而动员起来。小民百姓忙着寻找对抗妖术、自我保护的方法，各级官员穷于追缉流窜各地频频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庙堂的乾隆皇帝则寝食不宁，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后的凶险阴谋，并不断发出谕旨指挥全国的清剿。折腾到年底，在付出了许多无辜的性命和丢掉了许多乌纱帽后，案情真相终于大白，所谓的叫魂恐惧其实只是一场庸人自扰的丑恶闹剧：没有一个妖人被抓获（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子虚乌有），没有一件妖术案子能够坐实，有的只是自扰扰人，造谣诬陷，屈打成招。沮丧失望之余，乾隆皇帝只得下旨“收兵”，停止清剿。

“叫魂”这个故事就其本身情节来说已经够精彩的了，而经过孔飞力在书中的阐幽发微，从中说出了一大堆道理和教训来。我们读这本书时发现，孔飞力其实是将1768年的妖术恐惧重构为三个不同版本的故事，分别叙述了不同社会群体和角色对于叫魂妖术的理解和反应，这三个故事在书中纠缠交错在一起，但又各自线索分明。与此同时，他还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角度讨论了这一事件的种种历史意蕴。

第一个版本涉及的是贩夫走卒、乡愚村妇等普通平民百姓的经历。叫魂恐惧首先在社会底层爆发。乾隆三十三年初，浙江德清县城东的水门和桥梁因年久失修而倒塌，一支来自海宁的工程队投标失败无功而返，仁和县的石匠吴东明承揽了修建工程。这件事本来极为普通，却被邻近一个寺庙的和尚恶意利用。德清城外有两座寺庙，观音殿和慈相寺，观音殿香火鼎盛，而慈相寺则

门可罗雀。穷极潦倒的慈相寺和尚为争夺香火，便利用这个竞标事件散布谣言并发了传单，说投标失利的海宁石匠为了报复在县城外去观音殿的路上做了法，路过之人都要遭殃。这个谣言不脛而走，并被添枝加叶，变成了包工石匠要偷盗灵魂来加固水门和桥梁的基础。由于民间本来就普遍相信匠人有施法害人的魔力，于是有人便找上吴东明，求他将写有自己仇人的姓名纸条打进桥桩里。吴害怕惹出麻烦，将其扭送官府。这个倒霉的家伙受了一顿杖责。但这已经来不及止熄吠影吠声的谣言，它很快传遍了江南市镇乡村的各个角落，并继续扩散。一时间，人们谈妖色变，无端地猜疑，蓄意地诬陷，互相栽赃，演出了一出又一出闹剧，把大半个中国拖进了一场丑恶的歇斯底里。

在中国传统社会，妖术迷信和恐惧对底层大众来说绝不陌生，妖魔鬼怪、阎罗无常本来就是他们精神世界的一部分。但这种迷信和恐惧演成这样全社会的歇斯底里却并不常见，特别是在所谓的太平盛世。乾隆时代正是清代的所谓盛世，何以妖术横行？孔飞力故事的第一个版本，通过对普通人经历的叙述，对这个问题提供了社会层面的回答。

这里其实也涉及到了《叫魂》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那就是，孔飞力似乎不断地在讨论某些宗教现象，但他却从来没有正面地或系统地讨论中国社会历史中的宗教问题。这也是孔飞力其他论著中的一个特点。例如，在后来《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他也涉及到了中国社会的某些宗教现象，但没有专门就此进一步予以深入探究。

孔飞力关于叫魂叙事的第二个版本是各级官僚的故事。和愚不可及的小民百姓不同，官僚们是饱读诗书的知识阶级，他们不会那么轻易地相信叫魂妖术。再说官僚士大夫也一般不会有小民百姓的那种朝不保夕的衣食之忧，他们对妖术谣言更不会有切身的恐惧和不安。不过各级官员大都有维护社会稳定的“守土之责”，他们即使不信妖术，也不可能不担心民间妖术恐惧对地方治安及社会秩序可能造成的后果。无论于公（维持治安及秩序）还是于私（保住乌纱帽），妖术和妖术恐惧对他们都构成一种威胁，使他们不得不认真对待。

有意思的是，各级官员们尽管职位处境不同，品德操守各异，他们在妖术恐惧初起时的因应之道却大致相同。他们都力图息事宁人，安抚民间的恐慌，制止谣言的流传，打击无事生非、挑起事端的衙门胥吏和地方棍徒。虽然剪割发辫的所谓妖术似乎在挑战满清王朝的剃发制度，但没有人会轻易小题大做，把这种妖术恐惧与叛乱谋反联系在一起，并将其当做紧急的非常事件奏报朝廷。虽然事后的发展证明他们的做法是正确的，但这并不等于他们有先见之明，毋宁说这是官僚制度本身“照章行事”的逻辑在指挥他们的行动。

按照常规，地方官（首先是知县）有责任维持自己辖区的治安和稳定，并将所有超出杖责处罚的刑案报告省巡抚法庭，而死刑案则要由皇帝亲自审核。《清律》将多种妖术定为死罪，据此叫魂案似乎也应该移送省庭，并最终移送北京。表面上看来，对妖案无论是就地处理还是奏报朝廷，地方官都是在履行职责范围内的公务，而奏报朝廷还可以减轻他们自己的责任。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如果把发生的事件局限在自己辖区和职权范围之内，不仅可以给上司一种地方上“平安无事”的印象，地方官本人也可以按官僚制度的常规独立全权地来处理事件，而不必受制于专断独裁的君权。但是一旦朝廷和皇帝卷入了地方妖案的清剿，官僚制度优游从容的常规就会被打乱，地方官就把自己直接置于君权的反复无常的淫威之下。对地方官来说，要避免这样的结果，最好的办法就是息事宁人，把地方上的叫魂恐惧局限在自己辖区和职权范围内，对朝廷封锁有关的信息。因为按照官僚责任制的常规，一项罪行如果未被官方-朝廷确认，地方官员就不会因为对

此项“罪行”失察而受惩罚。这就是为什么在叫魂危机发生的最初两个月里，没有一个官员主动向乾隆皇帝报告过地方上发生的妖术恐惧。各省官僚的这种默契，织成了一张官官相护的网络，共同对皇帝封锁消息。

在中国历史上，充斥着报喜不报忧、“瞒上欺下”的现象。乾隆盛世也不例外。但尽管乾隆皇帝暂时被地方官员们蒙蔽，他毕竟在各省布有自己的眼线。通过这一独立于官僚体制的情报来源，他终于知道了春天在江南发生的那些“叫魂案”。一旦面临着君主的震怒和迫在眉睫的惩罚，各省官僚间原先的那种默契立刻便不攻自破了。山东巡抚富尼汉抢先一步，在本省发动了对叫魂妖术的围捕，各省也随着跟进。很快地，山东就抓获了许多“妖党”，并从妖党的“口供”中得知掀起这场叫魂恐惧的“妖首”就潜伏在江南。乾隆命令各省向山东看齐，并令江南各省缉拿妖首。在乾隆的巨大压力下，整个官僚体制终于被动员起来，在官员们互相攀比的情况下，一场对叫魂妖术的清剿迅速在全国展开。这场清剿持续了好几个月，在制造了无数冤案，找害了许多无辜无助的性命之后，才因破绽百出而被迫叫停。

当孔飞力在讲述这个关于官僚们对于叫魂案反应的故事时，他其实并非对官僚们处处予以非难和指责，而是将注意力也放到了发掘官僚们在叫魂案发生时的“捂盖子”反应的深层次原因，并从这里引出了他对于官僚们“谨慎的喝彩”的看法。

孔飞力所述叫魂案的第三个版本是专制君主乾隆（他在提到乾隆皇帝时都是径用其本名弘历）的版本。虽然乾隆皇帝只是一个人，他代表的却是满清帝国的整个制度；或者说，他是这种制度的人格化。

乾隆绝非昏君，他生逢其时，承继了经由康熙、雍正两朝而奠定基础的“盛世”。但他好高骛远，好大喜功，从平常人的角度来看，更是喜怒无常。他一方面将自己视为千古一帝，应该名垂青史。但另一方面，他的这种心态与其说是加强了自信，毋宁说是加重了他的猜疑心和内心深处不安全感与无处不在的潜在的危机感。这也是为什么乾隆朝会有那么多的文字狱的重要原因。他对于“盛世”以及“十大武功”之类的炫耀，以及后来以“十全老人”自诩，不仅是他好大喜功性格的表露，从根子上说其实也是他关于满清统治的一种“合法性声明”。（对此，我们以下还会进一步讨论。）在乾隆的眼里，凡是涉及到满清帝国“社稷安危”的任何问题，都是头等大事，即便仍处于萌芽之中，也必须予以彻底铲除；他对此的反应及作为，从来便有着一种“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极左”倾向。但同时，乾隆又深谙统治之术，在处理诸如叫魂一类的事件时，明明其中“剪人发辫”一项触及了他的“合法性”神经，但他却对此讳莫如深，不在任何场合提及。孔飞力因而认为，要为乾隆作传是极为困难的。（他甚至说过：“可能最终亦无人有能力为他作传。”）

不管乾隆是否真的相信妖术的存在，在他眼中，妖术的威胁及其背后所隐藏的政治阴谋却是确实存在的。他相信有人正在利用剪辫妖术来煽动汉人对大清帝国的仇恨，并阴谋挑起反满叛乱。所以，当他一得知地方上的叫魂恐惧，就立刻发动了对妖术的清剿。不仅如此，叫魂危机中官僚们的表现更让他愤怒和失望，并强化了他对官僚们，特别是汉人官僚们，一直以来便从未真正消失过的猜忌。在他看来，正是汉人官僚们的颜面怠惰、敷衍塞责、欺上瞒下、官官相护才使得“妖术”在帝国的江南腹心得以横行无阻，并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对于大清帝国来说，这种官场的腐败积习也同样是一种威胁，其危害程度并不亚于民间的妖术。这种腐败积习是以江南为

中心的汉官僚—士大夫文化的毒瘤，它侵蚀着满清帝国的活力，腐化着满洲统治精英的道德士气。要清剿妖术，必须首先对这样一部官僚机器加以整肃。

孔飞力在《叫魂》中对于江南的表述，尤其是他关于乾隆以及满清统治者对于江南的那种既欣赏、又戒备乃至敌视的心态描述，是全书中最为精彩的部分之一。与此相关的，则是满清统治者对于“汉化”的矛盾态度——若是没有“汉化”，则满清政权将永远是一个合法性严重缺失的外来政权；但若是全盘“汉化”，则满人又会面临着中国为什么一定要由它这个少数族政权来统治的合法性挑战。

乾隆从一开始就对这样一场包含内外两条战线的清剿倾注了全副的精力和热忱。他坐镇北京和承德行宫，通过与各省督抚间的秘密通讯渠道，直接指挥着各省的清剿。一时间，对妖术和妖人的清剿成了大清帝国的头等大事，各种行政常规，如田赋、科举、河工、盐政、肃贪，也都要为其让路。对清剿的任何延误都将受到严厉惩罚。各省的清剿奏章如雪片般地飞抵乾隆的御前，在加上他的御批指示后又迅速回到奏报人手中。乾隆运用其君主权威和帝王手段对他的督抚们不停地激励鞭策和训斥威胁，把这场两条战线的清剿上演得有声有色，紧张激烈。

然而，随着清剿的展开，妖术案的破绽却越来越多，但这并不能轻易地便动摇乾隆的意志和决心。他一方面命令各省将涉及叫魂案的重要嫌犯解往北京、承德，由他的军机大臣们直接会审；另一方面他又对各省官员们施加了更大的压力。他埋怨地方官员们继续敷衍姑息（这是事实），致使妖首至今仍然逍遥法外；又埋怨他们滥捕充数，滥刑求供（这也是事实），使得案情益加扑朔迷离，茫无头绪。他对官僚们的愤怒和失望随着案情的展开也日益加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清剿越来越成了他与各省官僚之间的暗中较劲，仅仅是为了整肃他们，清剿也必须毫不犹豫地继续下去。不过，至此为止，乾隆还没有处罚过一个官员——这并不是因为他不想这样做，而只是时机未到。正如他自己对督抚们说的，这时若惩罚官员，谁还会真心实意去从事清剿？显然，乾隆在准备秋后算账。

此时，事情出现了峰回路转的变化。乾隆的军机大臣对押解来京的嫌犯反复地交叉审讯，终于发现整个叫魂案根本就是一场冤案，而且冤狱的程度大大超出了他们的想象。迄至此为止，他们一直协助皇上在进行这场清剿，不过现在他们不得不考虑如何善后。为了避免整个朝廷陷入更大的尴尬，这些身处皇帝身边的重臣们表现出了相当的道德勇气。乾隆毕竟还不是昏君，权衡利弊之下，他很快接受了军机大臣们的建议，下令停止清剿。不过乾隆并不甘心认错，在下令叫停的谕旨中，他仍然坚持妖术阴谋的存在，只是由于各级官僚的玩忽职守，才导致了妖首至今逍遥法外。所以各级官员仍应保持高度警惕，等等。有了这样的说辞，乾隆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对各级官僚加以清算了。绝大多数涉及此案的官僚都因玩忽职守而受到降职、革职和流放的处罚，包括六名现任和前任江浙督抚。作为平衡，一些滥刑无辜以求假供的官员——尤其是江南各省的官僚——也受到了惩罚。相比之下，在清剿中滥捕滥刑，给朝廷和官僚机器制造了最多麻烦的山东巡抚富尼汉（所有关于叫魂阴谋的供词都是山东嫌犯在重刑之下编造出来的）却只受到相当轻微的责罚：他被贬为山西布政使，革职留任。当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不仅是一种满汉有别的做法，而且也是乾隆在为自己开脱。

## 既为“盛世”，何以妖术横行？

在讲述叫魂故事的过程中，孔飞力开始讨论这背后的历史意蕴。按照他的分析，叫魂故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传统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的一些基本问题。在《叫魂》叙事的构建中，孔飞力关于“乾隆盛世”的描述和讨论，提供了全书的背景和语境，因而是十分重要的。明清交替之际，也是中国在各个方面开始同“世界”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在中国的“漫长的十八世纪”的过程中（在西方学术界，这一般指的是从十七世纪下半叶至十九世纪初的整个历史时期），中国的人口翻了一番多，中国的经济规模、尤其是农业生产的规模也空前扩大。在这一现象的背后，有着中国介入“世界”的原因：诸如玉米、甜薯、花生等由美洲引进的适于在坡地上生长的新作物，不仅扩大了中国的农耕范围以及农业生产的规模，也造成了人口迁徙模式的改变——人们在向城市集中的同时，也移往未被开发和开垦的地区。与此同时，当中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时，为支付由中国出口的丝绸、茶叶和瓷器，国外白银和铜也大量进入中国，从而满足了中国因经济规模扩大而产生的货币供应量增加的需要，并成为支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性因素。所有这一切，并不是外部世界“强加于”中国的，而是中国社会及经济本身在新条件下发展演变的顺理成章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孔飞力在《叫魂》全书开篇时写下了“1768年，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的点题之言。其中的涵义是，早在西方国家依靠自己的技术与军事优势于十九世纪中期后强行打开中国大门之前，中国的发展已与外部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社会内部的种种变化也早已在为近现代中国的到来准备着条件。这是孔飞力在为叫魂案发生于乾隆盛世勾勒大背景。

但在孔飞力看来，乾隆“盛世”又只不过是一个锁金时代。满清王朝在经历了康熙、雍正两朝的苦心经营和休养生息后，到了乾隆时代固然达到了鼎盛阶段，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国库充盈，百姓安居乐业，并为传统史家所津津乐道，也为当代的研究者所重视和推崇。然而，若是透过表面的繁荣去探究社会财富的分配以及资源、财富和人口的关系，就可以发现社会深层潜藏的危机以及这些危机在社会意识层面上的反映。

清代前期的休养生息、和平发展以及中国同“世界”联系的加强不仅带来了经济和社会的繁荣，也造成了由人口急增而产生的各种压力。到了乾隆时代，人口过剩的压力已经明显地在中国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来，尤其是导致了粮价的上涨和通货（特别是白银）的膨胀。人口对资源和财富的压力当然并不是平均地分摊到每个人头上的。不同地区和不同社会阶层不仅受到的实际压力不同，他们对压力的感受和应对能力也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间的差距也日益扩大。人口压力的增加意味着生存竞争的加剧。对于处在社会底层又在经济落后的边缘地区的人们来说这加剧的竞争可以随时夺去他们生存的机会和权利，将他们裹挟到无家可归的流浪乞讨者大军中去。到底有多少不幸的人被抛进这支队伍，史家们没有充分的资料来做确切的估计，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的人数在不断增长，而他们的存在，则越来越成为社会上的“不安定因素”，所构成的威胁被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正是他们，成了民间妖术恐惧所攻击的首当其冲的目标，也是叫魂案中官府压制清剿的主要对象。

对大多数比较幸运的人们来说，特别是生活在富庶的经济中心如江南地区的人们来说，盛世的繁荣意味着他们还能通过辛勤劳作维持温饱。但是他们同样感受到生存竞争的严酷，对眼前和未来的生活缺乏安全感。眼看周围不断增多的流民乞丐，他们害怕同样厄运会降临到自己头上，他们汲汲于保住自己仅有的一份温饱，社会上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让他们如惊弓之鸟。当叫魂妖术的谣言在地方上一传开，他们脆弱的神经立刻绷得紧紧的，唯恐自己成为妖术的受害者。他们无法分辨谣言与真实，因为鬼神迷信本来就是他们精神世界的一部分，而他们的不安全感使他们变得更为神经过敏，所以对谣言他们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他们所希望的是知道妖术来自何方，这样他们就可以设法防范妖术，躲避劫难。流浪的乞丐、化缘的僧道（他们只是披着袈裟道袍的乞丐而已）大都来自他们所不知道的陌生世界，这些陌生的外人很自然就成了他们怀疑防范的对象。当然那些乞丐僧道也确有可疑之处，他们来去无踪，四处漂泊，或三五成群，呼朋引类。除了沿门乞讨外，也免不了鼠窃狗偷，甚至强抢强要，骚扰地方。对地方社会来说，流浪的乞丐不仅讨厌，而且易欺，他们是社会上最弱势的一群，没有任何权力，不论官府还是民间社会，来保护他们。相比之下，无权无势的小民百姓都可以对他们任意威福，把自己的焦虑、不满、愤怒、沮丧发泄到他们身上。在叫魂危机中，许多所谓的妖术案都是小民百姓或衙门胥吏、地方棍徒对流浪乞丐和游方僧道的攻击，这样的众暴寡、强凌弱是整个叫魂危机中常见的丑恶闹剧。许多无辜的乞丐游僧就惨死在这种暴民的攻击之下，成为叫魂恐惧的牺牲品。

在我们看来，孔飞力对于传统中国社会的分析尽管在书中所占篇幅并不多，却极为精彩及精到。叫魂恐惧为什么会演变成这样丑恶的全社会歇斯底里？除了专制君主乾隆的蓄意利用和许多官员的滥捕滥刑以图邀功补过外，它主要和民间社会的心态和行为有关。读《叫魂》一书我们可以看到，即便处于盛世，但在近代中国的前夜，整个社会充满了一股戾气，用作者的话说，叫魂恐惧向人们“凸显了一个特别令人不快的方面：即以冤冤相报为形式广泛弥漫的社会敌视”。虽然清王朝仍在其巅峰时期，通过叫魂危机，乾隆盛世已经向后人透露出了有关近现代中国许多悲剧之根源的信息。这是一个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各种社会矛盾急剧激化，并深受社会道德不断堕落所困扰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普通百姓怀疑可以通过辛勤工作来改善自己的境况。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令人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个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于是，人们便会不择手段地抓住任何趋利避害的机会，并不惜牺牲他人，特别是社会中的弱者，来保护和增进自己的利益。妖术和妖术恐惧恰好触到了民间社会的这根敏感的神经。而官府发动的清剿则把作为一种潜在威胁的妖术恐惧变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生存斗争，使得广泛弥漫于社会的冤冤相报的相互敌视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相互攻击。

## **君主、官僚体制与“政治罪”**

---

在传统的中国政治生活中，君主和官僚是同一制度中的两个方面。官僚的职责是维持帝国政治机器的日常运转，管理帝国的各级行政。官僚就其本性来说，倾向于按常规办事。从积极的方面来说，这种倾向有助于政治的理性化发展，但其消极方面则是助长官僚主义的惰性。官僚制常规权力的发展必然对君主的专断权力造成威胁。在传统中国的制度安排中，君主的权力是专断的和绝对的，其职责是制定重大决策和对官僚机器进行控制。如果听任官僚制度朝常规理性（和惰性）的方向发展，君主就会逐渐丧失其决策和控制官僚的专断权力。成为官僚制度的愧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韦伯争论说，君主的专断权力和官僚的常规权力是相互消长排斥的，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专制君主屈从于官僚理性化的常规。

孔飞力不同意这样的论断。他认为，在中国的制度中，专断权力和常规权力并不一定扞格不入，而很可能有和平相处之道。因此他把传统的中国政治制度定义为“官僚君主制”。那么，君主的专断权力和官僚的常规权力是如何和平相处，特别重要的是，君主是如何实现其对官僚的控制的呢？孔飞力通过对叫魂妖术危机的进一步讨论，提出了“政治罪”这样一个概念。他强调了政治罪为帝国政治的运作提供了燃料。按照他的定义，政治罪指的是威胁帝国安全的各种形式的谋反，它们是超出常规的非常事件，无法由官僚制度的行政常规来处理。这种非常的形势给了君主极大的自由来动员、驱策和整肃他的官僚，并强化他对官僚机器的控制（因为在常规情况下，一切行政事务都可以、而且应该照章办事，专制君主也不得不遵守由这些行政则例所定下的游戏规则，这种常规的管理给君主的活动留下的空间有限）。在叫魂危机中，乾隆皇帝正是利用了妖术恐惧这样的非常事件，迫使整个官僚机器把清剿当做压倒一切的政治，并以清剿的表现来赏罚官僚，从而强化他对官僚的控制的。

政治罪这个概念固然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政治中君主和官僚之间的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但在我看来，它却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韦伯关于君主专断权力和官僚的常规权力此消彼长的立论。这是因为，从理论上来说，君主的权力应该是绝对的，他对官僚的有效控制本来就应该是常规框架之内的安排，而无须借助政治罪这样的非常事件来大做文章。一旦他需要借助非常事件或手段来强调自己的专制权力，这表明他已经无法在常规领域内对官僚们实行有效控制。其实孔飞力也承认，在乾隆时期满清政治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这样的阶段，君主要“实现对官僚的有力有序和可靠的控制已变得十分困难”，因而政治罪就成为君主“不可或缺”的手段，以达到其“不如此就无法达到的目标：对有权有势的官僚精英的帝王控制”。从常规控制到非常规手段的这种转变说明，在官僚体制面前君主的绝对权力正在逐步削弱、但还没有削弱到连非常手段也无力使用的地步。事实上，到了帝国和王朝的后期，随着专制君主绝对权力的进一步削弱，运用政治罪这样的非常事件来强化对官僚的控制也变得越来越困难、越来越少见。乾隆以后，类似的叫魂恐惧又曾在民间发生多次，但没有一个满清君主抓住它们大做文章。除了形势境遇的不同之外，难道就没有韦伯的“咒语”在起作用吗？

如何看待官僚君主制，其实也是同孔飞力关于“现代国家”在中国形成的思考联系在一起。而他的这种思考的着重点，则不仅仅在于对于官僚君主制的批判，同时也在于挖掘其中相对合理、并有可能为现代国家形成提供“内在资源”的要素。事实上，在《中华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写完后，孔飞力有很长一段时间曾以1850—1949年的中国地方级乡村政治发展研究作为自己的主要课题。孔飞力写《叫魂》并不在他原来的“长期计划”之中，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当他接触到这个题目上的大量原始档案资料后，既为这些材料所吸引、又敏锐地感觉到其中有大

文章可做，“转向”而写成的。他关于中国政治文化及结构的很多想法，用到了关于官僚君主制的分析之中。与此同时，他关于中国“现代国家”形成“根本性议程”的一些基本想法也逐步成熟并系统化了。这些想法成为他写作《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提供了思想的素材，并在《起源》一书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发挥。

## “汉化”和满清统治者的“合法性焦虑”

若从更为一个深入的层面来看，贯穿叫魂案始终的是包括乾隆在内的满清统治者挥之不去、如影随身的“合法性焦虑”。孔飞力在《叫魂》一书对此有一些极为精彩的论述。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可以并值得进一步深究的大问题。

孔飞力在论述乾隆以及官僚们对于剪辮叫魂案的反应时，谈到了乾隆满清统治合法性问题上所面临的微妙局面。从表面上来看，满人征服中国已有一个多世纪，“满清大一统帝国为自身存在所作的装点和辩解看来已大体完成”，同时，“满人上层人士已学会了对中国精英文化的因应之道，而汉族上层人士则默认了满人的霸权地位”；然而，在乾隆的潜意识中，对于大清帝国因自身种族意象而受到合法性挑战的警觉，却从来没有消失过。

在这里，孔飞力的讨论涉及到了《叫魂》出版前后在美国学界讨论不断的“汉化”问题。（其中，较为重要的是十多年前何炳棣和罗友枝在这个问题展开的一场双方甚至动了感情的辩论——何炳棣认为，清代的成功应当归之于“汉化”；而罗友枝则强调，清代的成功奥秘在于大清帝国对于非汉族地区的有效统治。）我们认为，在清代，“汉化”本身其实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现象——满人并不仅仅是“汉化”的对象，也是“汉化”的主体——甚至在入关之前，他们就已经是“汉化”的参与者了。作为“中国”的统治者，又有着自入关前便开始的长期同汉人打交道的经验，满人对于“汉化”的特定形式、进程等，是有自己的发言权的。满清统治者实现“汉化”的实际过程，是同他们对于“中国”（包括文化、疆域，以及民族构成，等等）的重新塑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孔飞力从满清帝国“合法性”构建及维系的视角出发，对于满人在实现“汉化”及保持“满人本性”问题上的“悖论”处境的论述颇有独到之处。他指出，满清朝廷作为一个统治着中国这个大一统帝国的少数族政权，“既必须从普世主义的角度又必须从种族的角度来表现出自己高人一等的优越性”。一方面，他们必须表明，自身统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并不在于自己的种族特性，而在于德行与文化上为人普遍接受的规范”；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保护并颂扬自己的种族特性，以显示“正是由于满人的可贵的种族传统，他们其实能比汉人更好地统治中国，也特别有资格将儒家的道德箴言融入帝国的统治之中”。

在我们看来，乾隆处理“叫魂”案的心态中自始至终便混杂着一种或隐或显但却无处不在的“合法性焦虑”。从表面上来看，满人统治“中国”已有一个多世纪，来自汉人的有组织的抵抗已经消失，大清帝国似乎是巩固的，满清统治者似乎也拥有了一种对于自身“正统性”的自信心——而在乾隆的身上，这一点似乎表现得更为明显，这同“盛世”的表象似乎也是高度契合的。但

在骨子里，满人括乾隆皇帝在内——对于大清帝国能否真正长治久安却从来没有完全放心过。满清统治者越是炫耀“盛世”，越能够透露出他们根子上的“合法性焦虑”。

在这里，也许需要就合法性问题多讲几句。国家或政权的“合法性”不是一种一旦取得就可永久享有的东西，而是需要不断地予以构建、维护及加强的。这里所涉及的方方面面甚多，而其中极为关键的一点，便是国家／政权／统治者同社会／臣民／被统治者之间始终处在变动之中的关系。所谓“合法性”，其实便是后者对于前者是否存在，以及在多大意义上存在着心悦诚服的“内在接受”。正是在这一点上，作为“异族”的满人其实从来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做到高枕无忧。归根结底，一方面，满清王朝是由军事征服起家的，而征服的暴力与“合法性”的任何定义都属于风马牛不相及；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的族裔背景，满清统治者在关于自身“合法性”叙述的构建中，不管做出怎样的努力，其基本的、可供支配的资源却从来便存在着捉襟见肘的问题。这是因为，他们不可能改变自己的族裔背景，关于满清统治合法性的任何表述都会与汉族士大夫内心真正认定的“儒家道统”表述之间存在紧张，无法彻底消除。

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当这样的“合法性焦虑”存在时，统治者总是会试图诉诸经验事实的支撑（尤其是当情势允许他们这样做时），以便在经验事实的层面建立起正统性／合法性的支持力量。有清一代，直至鸦片战争之后，满清统治者在这方面一直借助于大清王朝实现了历朝历代所未曾做到过的建立空前的“大一统”帝国的经验与现实。在乾隆时代，关于“盛世”的经验及其表述，自然而然地也成为同大清帝国“合法性”的持续构建直接相关的问题。这里的逻辑是非常清楚的：有什么能够比之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的“盛世”现象为大清帝国的正统性和合法性提供更为强有力的支持？从这一角度来看，在乾隆的眼里，压制“不安定因素”不仅仅是一个常规的治安问题，也成了——一个涉及满清统治者“合法性焦虑”的根本性问题。

于是，从官僚到皇帝，都对盛世的种种潜在乱象持压制和否定的态度。一旦像“叫魂妖术”这样的“不安定因素”出现，官僚们的第一个反应便是“捂盖子”；而乾隆的过度反应，则是出于把一切不安定因素都消灭在萌芽之中的目的，而不是去（也不可能是去）深入追究事件背后的种种深层次原因。

然而，以“盛世”为支撑的“合法性”表述，具有明显的即时性质——“盛世”既然是一种经验事实，那么，它便有着随时势变化而改变的可能，这样的支撑因而不能不是极为肤浅、也是极其靠不住的。无怪乎，随着乾隆之后盛世景象的逐步烟消云散，大清帝国的合法性表述也变得越来越成问题，而它的统治根基最终也从根本上动摇了。